

能靜居日記

(一)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爲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個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選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在技術上也無法描摹。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有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相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的史料價值

吳相湘

日記，是某一個人日常生活的紀錄，是某一個人傳記的主要根據，尤其是某一重要人物的手書日記，如果保存有當時一些事件的原委曲折或他本人與同時人的心理動機和反應，更是包羅那一時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景象的直接史料，其價值益見高貴。在中國近百年中，幾部名人日記如曾文正（國藩）、翁文恭（同龢）、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等日記之被世人看重，即其顯例。

但這種有史料價值的日記，公開印行的究竟太少了。就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和致力傳記文學的學人看來，是希望多多益善的。因此，在幾經延擱之後，臺灣學生書局終於獲得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同意公開印行曾國藩的重要幕賓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五十四冊，實在是一值得歡迎的消息。

按民國六年小說月報第八卷第一二三期連載「趙偉甫先生庚申避難日記」，是趙氏「能靜居日記」第一次被人擇錄公開發表；但不幸的是這位獲觀趙氏日記並加以摘錄的人，不僅沒有把握趙氏日記內容的重點，甚至將趙氏的別字「惠甫」也寫作「偉甫」；美國國會圖書館刊行「清代名人傳略」英文本第二九四頁亦沿誤。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八冊第七五八頁，雖指出小說月報這一錯誤，但又將趙氏這一日記全稿五十四冊，誤作「六十四冊」。同書同冊刊錄陳乃乾編撰趙氏年譜，原係根據趙氏這一日記寫成，然而其中甚多錯誤，且將湘軍攻克南京一事

繫於同治二年，尤爲不可原諒的大謬誤。——這一謬誤不論是陳乃乾原本錯誤或今編者的疏忽，均不可原諒，因爲這是絕對年代不容有誤的，何況其中大事關繫年月和人名的錯誤不僅此一事而已。

一

要估定這一「能靜居日記」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上的史料價值，首先必須要認識手寫這一日記的主人趙烈文的事蹟。

檢查「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祇有閔爾昌纂錄的碑傳集補卷二十六「守令六」類有趙氏墓志銘。據這一墓志銘稱：「趙氏諱烈文，字惠甫，亦字能靜，江蘇陽湖人，自其少時，聲譽藉甚；顧不樂舉子業，三應省試，不中第即棄去。時洪楊倡亂，金陵不守，先生與族兄伯厚，同邑周弼甫劉開生諸先生講求經世學，思以靖禍變而保鄉里；曾文正公督師江右，以幣聘之往，俄歸居母憂。常州陷，避之滬上。值朝廷命曾公舉人材，公以先生等六人應。有詔令咨送曾公大軍錄用，遂居幕府，及忠襄公園金陵，文正公奏以先生參軍事，江南平，以功保直隸州知州。」「先生在兩曾公幕所贊畫，往往關天下大計。」

由是可知趙氏的簡歷以及他和曾國藩國荃的關係。然而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文中却將趙氏列在「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一類，以吳敏樹、王闓運、俞樾等與趙氏相提並論，與「墓志銘」所述顯有相當距離。

今試按趙氏「能靜居日記」及曾文正公手書日記與其他文件，即可發現薛福成並未能真正體認趙與兩曾關係；事實上是趙氏乃曾國藩事業高峯的主要幕賓。由於他對「夷務」和太平軍的認識，因之，他在曾幕是負責辦理有關「夷務」事宜。同治二年五月經曾國藩的要求和曾國藩的同意，趙氏特自安慶國藩軍營親蒞南京城外國荃軍營，協助策劃攻取南京。在南京克復後，趙氏重回國藩幕，在同治六七年時，是與國藩每日見面不拘形跡無所不談的主要幕賓，也是當時曾幕中可以隨時升堂入室的極少數人物。「能靜居日記」有云：

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今日直詣相國臥室，葛帳低小，布夾被草草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陳設紙筆之外，無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至滌師內室譚，見示初印本五禮通考，筆畫如寫，甚可愛。又示進呈之御批通鑑刊本，大幾半桌，亦向所未見。又以余昨言王大經禁淫書之可笑，指示書堆中夾有坊本紅樓夢，余大笑云：督署亦有私鹽耶！」

同治六年八月廿八日：「滌師留久譚〔論司馬光王安石〕。余又問王船山議論憂憂獨造破自古悠謬之譚，使得位乘時，其有康濟之效乎？師曰：殆不然，船山之說信為宏深精至，而嫌褊刻，使處國事，天下豈尚有可用之人！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語未完，余推手曰：大哉宰相之言。師掩面大笑曰：足下奈何掩人不備如此！方鼓掌次，材官持一紙示師，師領之，顧余曰：此何

物，足下猜之。余謝不敏。師曰：此吾之食單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簋，凡五品，不爲豐，然必定之隔宿。余稱佩儉德，因曰：在師署中久未見常饌中有雞鶩，亦食火腿否？師曰：無之，往時人送皆不受，今成風氣，久不見人饋送矣；卽紹酒亦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無此總督衙門！師曰：君他日撰吾墓銘皆作料也，相笑而罷。」

「同治六年九月初六日：滌師來久譚，譚次，師脫馬褂置榻上，又少坐卽去。余取視榻上衣：佛青洋呢面布裏琵琶襟，極短而小，蓋寒士所不屑衣者，爲之太息不已。」

抑不僅趙氏居會幕時期，兩人是如此地不拘形式，甚至當趙氏奉委直隸知州，正式晉謁曾氏（時任直隸總督）時也仍舊保留這種「親切」關係。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趙氏日記有云：

「與作梅、勉林約是日同赴上司稟到，辰刻勉林至官廳來邀，遂往偕候傳見，作梅歸司道班先上謁，余及勉林次之。相君〔曾國藩〕視之而笑。余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師奚笑爲？師曰：吾亦已陳之芻狗而已，吾笑夫學爲芻狗而未純乎芻狗者。余自循視亦爲一矧而退，以次謁藩司臬司。」

就以上隨手所拈舉的數例，趙氏與曾氏親密而不拘形跡的關係可以概見。在這一優越條件下，趙氏「能靜居日記」中所記載的有關曾氏公私生活言行，史料價值的珍貴，是不待煩言的。

咸豐九年曾國藩致李續宜手札有云：「此間軍事，其大者已將摺稿抄達尊處，小者本無足錄，承索取日記，其中瑣事太多，間有臧否人物之處，未便抄呈，舍九弟處今年亦未抄也」（曾文正公手札墨拓本第二冊第九頁）。是曾國藩生前就已不願將他的日記公開示人了。但其身歿以後，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王闓運在曾氏諸孫影印曾氏手書日記全稿的序文中又這樣指出：「至於每日論人事臧否決斷則不詳於冊，蓋仍自省之意，非欲示當世也。」並且「惜其記事簡略，非同時人莫能知其厓涘，故闓運觀之而了然不能喻之人也。時歷四紀學裴松之以注輔志，則記錄文字不備，無從搜求證明，此輪扁所以歎糟粕，與慨想音容，悲其志事，既曠然而又泣然也。」民國五年闓運既歿，這一「以注輔志」註釋曾氏日記的工作，就更顯得希望渺茫。

但現在由於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的公開印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人，或者是企圖更瞭解曾國藩志業及其日常言行與臧否人物實況的學人，顯然都可以獲得某一部份的滿足。例如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關係是世人最喜談論的，曾左本身文字中也間有涉及，但趙氏此一日記中保存這種史料更多，可供我們參稽比證（如同治三年三月初三日等趙氏日記）。再如郭嵩燾與左宗棠交惡事實，郭左文集中各持一說，後世論者甚難折衷至當。今趙氏日記中既保存有曾公對左的品評，同時也保存有甚多曾公對郭的評論：「自命太高」、「恃已蔑人」（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及七月初五日趙日記。）實可謂恰當。此外類此的有關臧否人物的記載甚多，研究咸同風雲人物的學人由於這一日記的印行，從此應該要感到便利，或者要修正過去若干觀念了（曾國荃參劾官文情事，趙日記保存甚多資料）。

抑不僅如此，「能靜居日記」中更保存了許多曾公的自我描畫和批評。例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趙日記有云：

「見李少帥〔鴻章〕信摺，力訐東撫丁寶楨疏防之咎。午後滌師來久譚……師又曰……李少荃此摺幾幾訟師之筆，丁撫恐受不住，非沅浦參官相，革去總督，仍留宰相之比也；因笑述吾去歲陳言請註銷侯爵，以極重之事而下註銷極輕字樣，官相處分內廷戲弄出之，以大學士赴京供職則總督去留無關緊要，以極輕之事而下革去極重字樣，李少荃引以相儷，事在一時，天然的對，可爲絕世文心。余曰：少帥事機不順未必能如師宏忍。師曰吾諡法爲文韞公，此邵位西之言，足下知之乎？余曰此一字簡明的當，邵君誠知言也。」

按邵位西卽邵懿辰，爲曾公任京官時同僚。「韞」字含柔而固之意。實卽曾公常自提及的「挺經」一詞的最簡明的寫照——所謂「挺經」卽曾公的處世處人之道。歐陽兆熊「水窗春嚶」及吳永「西狩庚子叢談」均曾提及，唯均後人追述。咸豐十一年夏曾公手書致李續宜札中言及太平軍攻祁門時：「此三旬危險之際，鄙人不肯移出嶺外，此固執之挺經也」（曾文正公手札墨拓本第三冊第十八頁），才可說是曾公手書中提到「挺經」二字較早紀錄。但以今看來：「文韞」之稱，早見於其任京官時，這對於研究曾公個性修養與其事業成功過程上說，實在是一大貢獻。至於「能靜居日記」中所記曾公對其九弟國荃的坦白評論，更可見曾公的修養。

最值得注意的是「能靜居日記」中所保存的曾國藩和趙烈文評論宮廷人物及其舉措的言論。例如「能靜居日記」有云：

「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下午滌帥來譚，晚又要至後圍納涼，譚至二鼓，余言在上海見恭邸小象，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壓百僚。師曰：然。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師曰：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亂之後而議減征，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爲何如？余曰：天道窮遠難知，未敢妄對。三代以後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則如諸葛輔蜀，官府甚治，而卒不能復已絕之炎劉；金哀在汴求治頗切而終不能抗方張之強韃；人之所見不能甚遠，既未可以一言而決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許其不覆！議減征，創自外臣，非中旨也；免報銷則以此番餉項皆各省自籌，無可認真，樂得爲此寬大，亦巧見耳。勤政誠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見長，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誤。夫以君德卜國祚之靈長允矣，而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一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師又言本朝乾綱獨攬，亦前世所無，凡奏摺，事無大小，逕達御前，毫無壅蔽，即如九舍弟參官相摺進御後，皇太后傳胡家玉面問，僅指摺中一節與看，不令觀全文，比放譚綿二人查辦，而軍機等邸以下尙不知始末，一女主臨御而幾斷如此，亦罕見矣！余曰：然，顧威斷在俄頃

而蒙蔽在日後，究竟此類模糊了局不成事體，覆疏全無分曉未見中旨挑斥一字也。大家規矩素嚴，臧獲輩當面謹愿奉法，而一出外則恣爲欺蔽，毫無忌憚，一部紅樓夢卽其樣子又足多乎！所謂幾斷者不在形跡而在實事，一語之欺，清渾立辨，則羣下無不惴惴，至其面目轉不妨和易近人，蓋所爭在彼不在此也。」

按世傳彭玉璠王闈運等曾數以滿清宮庭腐化，曾公應速作非常之舉動。惟彭王言論及曾氏反應無直接記載可尋（註一）。今趙氏此一記載之重要性，實值得非常之注意，因爲曾公言語雖簡，然究其所論主題及趙氏答語研究，可以說是直接證明曾公左右確有不滿朝廷的「反動人物」作「煽惑言論」；並且曾公對於這種「煽惑言論」沒有加以申斥！

在拙著「晚清宮廷實紀」（正中書局印行）中，筆者引錄曾公起義師之初寄胡林翼書：「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同時指出曾公：「不滿意於當時朝局，而寄希望於未來之心理，與成功不必自我之態度，及其努力之目標均於此昭然若揭。」現在有此趙氏日記種種記載，更可加強相湘過去之論點。抑「能靜居日記」又有云：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滌師來久譚，言北宋人物，咸推韓范，其實無大過人處……師曰：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又言：韓岳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彷彿與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余笑言：師事成矣而風氣則大關蹊徑，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

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雖人事亦天意而已。師曰：吾始意豈及此？成敗皆運氣也。」

這裏所謂：「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特別值得注意。因為按之一般國史論者的說法：辛亥革命時各省紛紛獨立，實淵源於湘軍造成的「內輕外重」情勢。今有此掌握中國近代歷史動向人物「志業」的當時記載，實益足加強後人論斷的正確。「能靜居日記」類此之記載甚多，在研究曾公與清廷關係上，實在是最佳的直接史料（例如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等）。

同治七年秋，清廷爲糾正「內輕外重」之情勢，特將曾國藩自兩江調任直隸。曾公手書日記中曾錄當時覲見慈禧安慈禧兩太后及同治帝問答語，而未有評論或觀感。今幸趙氏日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備載其事，可見曾國藩思想之轉變：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謁師久譚……余又問軍務夷務及內廷國是之有無定論。師蹙額曰：到京後曾會議和約事，醇邸意在主戰，曾上摺交內閣再議，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設防奏覆，然中外貧窘如此，無論直隸江蘇亦安能自立？今年和約當可成不致決裂，而時會難知，能無隱憂。又言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祥〕寶〔璽〕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璽〕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良峯〔仁〕，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

就現在已行世的晚清名人日記文集看來，如曾公這樣坦白地批評帝后及宮庭當政人物，實在是罕見的。因此，我們如果仔細綜觀「能靜居日記」加以利用比證，不僅王闓運所謂「惜其簡略」「悲其志業」的缺陷可以補充，甚至中國近代史上若干問題也將獲得新解釋。

四

上面說過：趙氏是曾國藩事業高峯的主要幕賓。所謂「曾國藩事業高峯」當然就是指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和同治三年克復南京與其後一段時間而言。在這一段時間內有關的史料原相當豐富的，但趙氏「能靜居日記」中却保存了更多的直接資料——例如安慶收復前後，趙氏均曾親履其地，在日記中留有直接觀察的記載。南京克復以前，趙氏幾次至南京城外，特別是同治二年五月他應曾國荃邀請，蒞臨南京城外軍營協助策劃戰守，以迄同治三年六月湘軍克復南京，這一段時期的日記是最值得近代史學人注意的。例如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記有云：

「仇涵齋來言；城北各營頗不守法，江北民渡江耕種，鍋鏟俱爲所奪。……彭次卿來久譚亦以外營多不奉法，沅帥〔國荃〕寬慈重情，軍政頗弛，相與憂之，又江東橋所出難婦，陳舫仙部下截留幾半，屬商舫仙此後以幫辦押送。入晤中丞〔國荃〕告以外間所聞。中丞言：各營欠餉過多，勇丁多食糜粥，各統領營官俱愧見之，無緣更繩以法，目下食米將罄採辦無地，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勢！又言夜夢登高山至頂，顧視無返路，進退不可，疑非吉兆，言次神色憂沮。」

由此可見，湘軍頓兵堅城之下，糧餉不繼，紀律鬆弛，將成瓦解的情形。當時清廷命令李鴻章准軍增援，而曾國荃又恐數年辛勞，爲他人攘去（註二）。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譜」卷二第七頁備言其事云：「金陵諸將以城破可計日待，恥借力於人，鴻章亦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穆宗欲速其功益促鴻章激之，公（國荃）亦以此激諸將，期必破。」如今趙氏「能靜居日記」於此事更能道出其曲折，益可見國荃等心情之矛盾：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見李中丞五月十七日片：『曾國荃地道如轟不開，須砲隊協助，則臣處所有砲隊須全調往。』按此摺明以此間不願會攻之意入奏，而冷眼覷定，不至此間地道無成，急迫求助之時，不來會攻，噫，可謂堅矣。」

「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見少泉宮保來咨：已派劉士奇潘鼎勳劉銘傳周盛波等二十餘營來助攻，十六拔營，中丞〔國荃〕在龍膊子行營接此咨傳示衆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衆皆曰：願盡死力。」

按「六月十五日」即國荃軍攻克南京之前夕，鴻章所謂「十六拔營」亦即國荃軍克復南京之當日，於此可想見鴻章國荃兩人勾心鬪角之實況。（朱洪章「從戎紀略」第五二頁所言殊過份誇張自己才能）。然綜觀趙氏前後日記，則益見國藩國荃之成功，絕非偶然，梁啓超所謂「毅力」之論可稱定評。

是年六月十六日以迄年底的趙氏日記，提供了有關湘軍克復南京情形最重要的直接史料，由於這些史料，過去若干記述或研究，必須重加考慮改寫。

有關李秀成被擒以及其伏法的事實，也是「能靜居日記」的重要貢獻。然而羅爾綱撰「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不完全的引錄趙氏日記，以求適合其有政治作用的論點，實在不足為訓（註三）。

按有關李秀成處置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稱：「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為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今按「能靜居日記」的記載却與此頗多不同。「能靜居日記」有云：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聞生擒偽忠王〔李秀成〕。中丞〔國荃〕親訊，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或告余，余以此人內中所重，急趨至中丞處，耳語止之，中丞盛怒于座躍起，厲聲言：此土賊耳，安足留，豈欲獻俘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動。少選復縛偽王次兄福王洪仁達至，逆酋之胞兄也。刑之如忠酋，亦閉口不一語。余見不可諫，遂退。少刻，中丞意忽悟，命收禁，延余入問當如何？且言此人緩誅亦可，若恐有獻俘等事將益朝廷驕也。余言：獻俘與否不必自我發，但此係巨酋，既是生擒，理當請上裁決，譬如公部將擒之而擅殺之，可乎？不可乎？中丞無以應，因命備文咨中堂〔國藩〕。」

「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入與中堂中丞久譚，中堂回奏：洪秀全已伏冥誅之事及李秀成先行正法各情。」

「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偽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寫親供五六萬言，敘賊中事，自咸豐五年後均甚詳，雖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賊中不可謂非桀黠矣。中堂甚憐惜之，昨日親問一次，有乞

恩之意，中堂答以聽旨，連日正踟躕此事，俟定見後再相覆。今日遣李眉生告以國法難違不能開脫。……傍晚赴市。中堂令免凌遲，其首傳示各省而棺殮其軀，亦幸矣。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中堂囑看李秀成供（註四），改定咨送軍機處，傍晚始畢，摺中聲明李秀成自知必死，恐中途不食或竄奪逸去，轉逃國法，故於當地凌遲處死云云。」

讀者如以曾文正公奏稿與「能靜居日記」一加比對，兩者之間顯有距離。很顯然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人由於這一直接史料的公開，是有若干問題必須重加稽證與解釋的。

除開趙氏在曾幕見聞所及的記載以外，「能靜居日記」中同時也保存極多有關太平軍行動的資料，例如上述小說月報刊載的「庚申避難日記」即其一端。再則由於趙氏接觸人物和地域的廣泛，又能隨時留心記載，例如咸豐十一年二月辛丑朔日記，載其在岳陽麓角驛舟中聞吳南屏（敏樹）言太平軍攻長沙事等等，均有甚高價值。

五

趙氏「能靜居日記」不僅提供若干新史料，可供治近代史學人的引證，補充過去若干記述的缺漏，同時由於這一「日記」也可以訂正若干中外書籍記載的紛歧矛盾。

例如南京克復之前，英國軍官戈登（Gordon）往訪曾國藩國荃，表示願意協助攻城一事，據曾文

正手書日記同治三年五月十九日云：

「已正，英國兵官戈登來一會，同來者有好博遜，又有一通事名陳瀛，坐談良久，遞一說帖，言攻金陵，須調蘇州之開花砲等語。」

按有關戈登會晤曾公事實，就現在臺北所能看到的三種不同的戈登傳記英文本看來，即互有歧異。例如摩爾斯「在太平軍時日」(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 An Historical retrospect by H. B. Morse. 1927)第十六章記載戈登先至安慶見國藩，然後到南京城外見曾國荃。至與兩曾晤見時日均未確切指明。不過提及同行的「Mr. Hobson」與曾日記「好博遜」同。

然而「中國戈登故事」(The Story of Chinese Gordon by A. Egmont Hake 1884)中刊載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戈登在南京城外寄友人信，則稱彼於是年六月十六日到南京城外，次日晤見曾國荃，十九日晚即將往見國藩。與摩爾斯記載恰相反。

包齊「戈登生活」(Life of Gordon by Demetrius C. Boulger 1896)第一卷第一二〇頁於此會晤情形記述不如上兩書之詳，惟明記其訪晤國藩時日為陽曆「六月二十六日」。按之鄭鶴聲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是日即陰曆「五月廿三日」，與曾公手書日記時間不符。

中外的記載是這樣的矛盾紛歧，這實在使治史的人感到困惑。——但這一問題，現在由「能靜居日記」却可能得到相當的解答。「能靜居日記」有云：

「同治三年五月十一日：聞夷帥戈登二三日中須來營次。

「同年同月十四日：中丞「國荃」來，適典謁言，夷將戈登即至，並有來函約相見時候。擬戈